

学习与参考

目 录

党政之声

- 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 (2)

理论之光

- 全面深化改革应破除五大“思想藩篱” (3)
以文服人的文化力量 刘海涛 (5)
警惕走入西方“民主陷阱” 张树华 赵卫涛 (7)
警惕“普世价值”话语陷阱 唐利如 (8)

党的建设

- 党政、党群和党法的关系 张荣臣 (9)
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 王伟光 (10)
党员干部进补“四要” 邓新华 (11)

时事热点

- 中国软实力 (12)
共治食品安全 (14)

名词解释

- “拉锯效应”及“约翰逊效应” (16)

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

这是一种包容发展型的安全观，而不是追求消除威胁与潜在风险的绝对安全观。它注重对安全成本的评估，不做“不计成本”排除威胁的黩武之举。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就是“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他指出：“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将发展置于亚洲安全议题的核心，可谓切中肯綮。与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集中的地区不同，亚洲多数国家还处于不发达或发展中阶段，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还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必须通过发展或经济增长来解决。

贫困是祸乱之源。当匮乏成为常态，掠夺成为活命的手段，生产者成了被剥夺的对象，人心将会败坏，秩序也随之崩溃，安全问题将陷于无解。这种局面又反过来降低了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社会将更加贫瘠。跳出上述恶性循环，既需要内部努力，也需要外部的合作与支持。

要使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深入人心，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制度性安排的保障。

首先，需要一个接入国际市场的

平台或通道，以便将亚洲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要素接入全球化的生产分工网络，同时把生产出来的商品与服务接入区域或全球市场。

这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了要求。亚洲国家内部发展阶段的多样性，使得低收入国家有可能将要素和产品按照一定的梯度，逐级渗入国际市场。发展水平在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新兴经济体，为这种追赶式的升级提供了阶梯。

其次，需要一套适应亚洲地区需要的融资机制。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的发展融资安排，有一套严格的缺乏弹性的附加条件，相当程度上无视各国实际情况，降低了资金的可获得性与运用的有效性，不能完全满足亚洲国家的发展需要。而中国倡导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弥补现有投融资机制的不足。

集中于基础设施投资有三项优势。一是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来打破欠发达国家可能面临的“资源诅咒”。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欠发达地区低成本接入世界市场，激活国内的生产

与投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出售资源增加消费的阶段。二是可以发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产能转移的优势，形成梯次发展、共利互赢格局。三是可以把区域内外主要国家的重要利益捆绑在一起，增加相互依赖与互信，创造更稳定的国际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规模大、周期长，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与亚洲建设项目，一旦投入，各方会因为这种合作关系的破裂而蒙受重大损失，这反过来强化了各方同舟共济的意愿。这意味着，在进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也在为地区

安全和信任而投资。

此外，还需要就“发展中的安全问题”及“安全视域下的发展问题”开展信息交流与政策协调，并设立相关的常设工作机制。

归根结底，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是一种包容发展型的安全观，它不是追求消除威胁与潜在风险的绝对安全观。它注重对安全成本的评估，不做“不计成本”排除威胁的黩武之举，它的底线是保证安全问题不成为区域发展与合作的障碍，反而为促进发展助力。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全面深化改革应破除五大“思想藩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号角，绘制了“五位一体”全景式改革的蓝图。然而，“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遇到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克服部门利益掣肘和思想障碍，方能乘风破浪，砥砺前行。以笔者之见，具体来说，应破除“五大思想障碍”，也是“五大恐惧症”：

一是“权力群体害怕革自己的命”。目前，改革已经濒临深水区，重点应是扩大民主、简政放权、还权于民，但要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似乎很难。早在改革初期，小平同志就提

出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甚至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形成“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局面，附着在某些权力上的既得利益正在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得到巩固。一些部门和官员，对权力爱不释手，怕既得利益受损，对改革态度消极，裹足不前。

二是“先富群体害怕减自己的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先富阶层捷足先登，是这项政策最大的受益者，许多地产大亨、商业巨头就是他

们的突出代表。但他们在捞得第一桶金、赚得盆溢钵满之后，就想维持现状，害怕深化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奶酪”，幻想把“权宜之计”当做“不变之策”。他们恰恰忘记了小平同志一再明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先富”则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当把手段当成目的时候，必然偏离改革的方向。

三是“垄断群体害怕破自己的垄”。改革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放开搞活，但应循序渐进，不可能“齐步走”，在一段时间内，对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继续实行“特殊垄断”是必要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如果不加改变，就会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现在，国企垄断的弊端显而易见，由于一股独大，导致行业暴利野马脱缰，难以驾驭，其经济收入与其它行业相比，差距甚大，助推了社会分配不公。当前，对“国企破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社会各界呼声强烈。但垄断群体不为所动，依然“抱着葫芦不开瓢”。

四是“劳动群体害怕失自己的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总体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也难免发生失误和偏差，导致劳动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主人翁地位弱化。如“教育产业化”，导致教育收费膨胀，老百姓出现“上学难”；“医疗市场化”，导致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导致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国企改革倡导“经营者持大股”，加

剧分配不公；地方政府炒卖土地，强行拆迁，造成平民百姓“权利贫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让劳动群体利益受损。纵观以往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总是习惯拿老百姓的“饭碗”说事，没有打烂领导者的“铁饭碗”，却砸碎了劳动者的“泥饭碗”。

五是“边缘群体害怕增自己的痛”。在社会变革过程还催生一些“边缘群体”，由于他们所处位置的边缘性，在社会建设中极易被忽视，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生活质量、权益保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如“农民工”，他们许多人离乡背井，到城市打工，已经不再是农民，可他们的地位在城市又没有得到确认；许多城市近郊农民，由于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征用，他们成为无地耕种、无工可务、没有保障的“三无”农民；还有隐性失业人员，在中小城市，许多国有企业职工已经下岗多年，却仍然保留着国有企业职工身份，不能享受国家对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等等，他们害怕进一步改革加剧自己的痛。

毋庸讳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们要想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以上“五大思想障碍”。特别是要克服来自体制内的阻力，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方能达到预期目的。

（摘自《新华网》）

以文服人的文化力量

刘 海 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这个论断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包含文化因素。

文化来源于历史的积淀。每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就是文化。中华民族早就懂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力量。这个“化”就是以文服人。所谓“服”，既不是武力征服，也不是文化专制和精神控制，而是通过“文”的基本要素——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去影响人、说服人、感召人，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

以文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奥秘所在。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历史上是这样，当代也是如此。因此，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汲取文化的力量。

中华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力量。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认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因此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之说。秦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司马迁的巨著《史记》，更是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既追求国家的统一，也追求文化、民心的统一，由此产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越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爱国主义就越是绚丽多彩。屈原对民生的关怀，岳飞的报国之心，范仲淹的忧乐观，邓世昌的民族气节，等等，都产生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国家是封建皇帝一人之“家”，爱国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忠君”的烙印。但是，在克服这种局限性之后，中华民

族对自己祖国热爱的情怀，仍然是今天可资继承的宝贵思想财富。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民能够团结御辱，克服艰难险阻，排除内忧外患，其内在动力源自数千年来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在中国，社会主义冠以“中国特色”表明了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有机统一。这种文化的力量也要运用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治国理政的过程中。

中华文化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现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但中华文化也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提供了沃土和营养。“大同”、“民生”、“实事求是”等观念和方法就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相衔接的重要中介。儒家以复古的形式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礼记·礼运》就假托孔子之言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的社会。《春秋·左传》中也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古训。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本身就是古代的一句成语，可以说，它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形态。孙中山、梁启超、钱穆等政治家、思想家都曾把“国人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等同

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早期的学者也曾用“大同”来翻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外来语。虽然理解有误，但社会主义日后在中国的传播确实以此为思想基础，从中汲取了许多智慧，并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涵。因此，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产生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中国人的身体中流淌的是中国文化的血液，因此，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服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警惕走入西方“民主陷阱”

张树华 赵卫涛

时至今日，乌克兰陷人民主的迷惘与转型陷阱难以自拔。这一深刻教训，对正处于转型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一是要对一些西方大国打着民主旗号，实则输出动乱的战略意图保持高度警惕。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民主已经被严重地泛国际化，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等。西方民主已经异化为一些西方大国对外扩张的政治工具。它们将民主包裹上华丽的外衣，以各种手段大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然而，西方大国对外输出民主的意图并不是要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而往往有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盲目接受这种所谓的“民主指导”只会落入西方大国的政治圈套，使国家堕入动乱的泥潭。二是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认清西方假民主和劣质民主的危害。民主概念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民主制度的真正实现有赖于稳定的国家认同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成熟的政治文化环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和发展阶段，一切片面化、标签化、碎片化了的民主都是虚假甚至劣质民主，不仅违背民主真谛，更

有可能给整个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三是要对发展中国家盲目推行民主所造成的实质性危害保持清醒认识。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制度建设、民主文化等民主的必备条件尚不完善，盲目推行民主，其结果只能是国家动乱，人民遭殃。以乌克兰为例，在20多年的西化历程中，获得民主化“红利”的几乎都是掌握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少数寡头，广大人民则无缘分享民主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四是要认清西方大国及其代理人对外鼓吹民主的实质。纵观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民主化的历史，在一些西方大国民众输出战略实施过程中，往往不乏一些盲目崇拜和迷信西方民主的“公知”或“民主小贩”的身影。在对某些西方大国民众输出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也必须认清这些代理人及其相关言行的实质。五是要树立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自信。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建设要统一于政治发展总目标，要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进程相协调。只有在上述目标实现统筹兼顾和综合提高的基础上，才能确保民主政治建设任务的落实。

（摘自《党建》）

警惕“普世价值”话语陷阱

唐利如

为了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政治野心 and 经济利益，西方国家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建设，而且高度重视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建设。他们给“普世价值”戴上美丽的光环，巧妙地设计话语陷阱，使对手束手就擒。一是别有用心地构建话语体系。利用强大的舆论工具，将他们的价值观说成是“普世价值”，将“普世价值”宣称为全人类应当共同遵守的。然后，罔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简单归结为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宣称“普世价值”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落后、实现文明进步的唯一选择，最后推导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从而为世界量身定制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话语体系。二是制造话语陷阱。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以“普世价值”为思想利器，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布设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迷魂阵”：如果你默认或者接受“普世价值”，则正中其下怀；如果你反对“普世价值”，他就直接给你带上独裁、反自由、反人权等帽子，说你愚昧落后，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三是垄断话语霸权。西方国家

早已习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来评价非西方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只要这个国家和民族取得了成绩和进步，直接来一个“万法归一”，说成是遵循“普世价值”的结果；如果这个国家和民族停滞不前或者陷入困境，不问青红皂白，全都归结于没能有效践行“普世价值”；假如不按西方的要求和意愿行事，就被贴上“极权统治”和“违反人权”等负面标签，实施各种制裁，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压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四是不遗余力地推动话语输出。西方社会在全世界宣传和推行“普世价值”，花样不断翻新。例如，以指导发展为名，大肆输出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使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帮助转型为名，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大伤元气；“9·11”之后，以反恐为名，武力入侵阿富汗；进入新世纪，借民主之名，策划“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普世价值”不仅没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福音，反而引发社会持续动荡。历史充分说明，“普世价值”非但不是非西方国家走出贫穷落后的灵丹妙药，而且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历史的悲剧，最终结果是沦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国”。

（摘自《红旗文稿》）

党政、党群和党法的关系

张荣臣

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就是如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既解决好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又处理好党同国家政权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是执政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能力的现代化。

关于党的自身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努力，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格局，使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要求。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仅是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上把党建设成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先锋队，更重要的是从党的内部机制上，按照执政党的特点，在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上进行创新，建设一个充分发挥执政功能的先进性的党。然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党，不仅是指关键在党的自身建设，更主要的是指关键在处理好党

同国家、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党政、党群和党法关系问题。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建立起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国家政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世界上，那些社会发展比较稳定，进而政党执政比较有序的国家，一般执政党同政府关系也比较规范化。共产党执政虽然情况有其特殊性，但在党政关系法制化、规范化方面，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从必要性上来讲，党政关系的法制化规范化，可以从法律上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使领导制度、执政方式明确化、具体化，从而更有利于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在国家中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党的正确领导，保证社会的稳定、健康地发展，在政治变革和发展中不致产生大的波动，使我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社会迈进。从可行性上讲，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是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既要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

依法履行职能。

表面上看，党群关系指的是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密切党群关系，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和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构筑一个能够互动起来的党群关系模式，就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是整体和统一，不强调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更不强调个人和局部利益的表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多元化利益主体，人们追求各自的利益，已成为正当的权利。压抑个体和局部利益，已经不现实。因此，亟需

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多元化相适应的联系群众、保持社会稳定的方式。

处理好党法关系，就要坚持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又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但执政活动和领导活动在功能范围上是有区别的，“领导”是针对全部的国家和社会生活而言，而“执政”主要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在活动方式上，领导活动主要是政治活动，而执政更多的是依靠法治。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党并不谋求凌驾于法律之上和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在法律面前，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主要靠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无疑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变革和进步。

（摘自《学习时报》）

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

王伟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一是严明的纪律是党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她同一切

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严明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二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是重中之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基础，

是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具有特殊重要性。三是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着力提高党性修养，激发遵守党的纪律的内在动力，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做遵守

党的纪律的表率，同时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强化严明纪律的制度保证，进一步加大对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增强党纪的刚性约束。

(摘自《光明日报》)

党员干部进补“四要”

邓新华

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根本目的是促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

精神上要补“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人生如屋，信仰如柱；柱稳屋立，柱倒屋塌。有的党员干部心无定根、迷失自我、碌碌度日，大都不知信仰去哪儿了。革命理想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把理想信念与理性务实结合起来。具体来讲，坚定理想信念，就是不谋私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就是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修养上要补“气”。党员干部要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念好理论修养、作风修养、品德修养、纪律修养的真经，做到多正气、多大气、多朝气、多和气，少泄气、少暮气、少脾气、少怨气。一、于内要养静气。要超然于名利之外，多一些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干事，多一些清清白白为官用权；二、于外养大气。习总书记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党员干部见突发事件乱不了方寸，面对诱惑失不了定力，归根到底就在于是不是注重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养性；三、于心养清气。党员干部境界的高度决定人格力量的大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要切实改进作风，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公私问题，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增强定力、把稳操守。

工作上要补“能”。党员干部要

补务实之能、高效之能、适应之能和担当之能，最紧迫的要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补服务之能，勤于服务。唯有勤于善于服务，个人才能不断进步，事业才能不断发展；二是补创新之能，勇于创新。创新永远是时代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工作水平提高的明显标志；三是补奉献之能，甘于奉献。要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其位、谋其政、尽其力，把学习、创新、服务体现在工作中，体现在岗位上。

作风上要补“位”。党员干部要大兴好学之风、亲民之风、尚俭之风，使良好作风归位、转变作风到位。一是大興好学之风，就是把学习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大学”里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在“社会大学”里增加群众工

作能力，在工作实践中练好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二是大興亲民之风。“德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利民，政莫高于亲民。”只有经常走出机关，到最基层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取得真经，才能增长智慧、补充营养、获得能量；三是大興尚俭之风。节俭清风不是一阵风，也不是和风细雨，而应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员干部要积极投入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上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的“必修课”，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以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推动发展、树立形象、取信于民。

（摘自《人民论坛》）

中国软实力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用了短短30多年的时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引发诸多发展中国家效仿。

一、文化

1、传统文化

孔子学院始建于2004年。

截至2014年3月1日，120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443所孔子学院、64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3年注册学员已

达85万人。

2、电视剧

2012年以来，《媳妇的美好时代》走进非洲，《金太郎的幸福生活》缅甸热播。

《甄嬛传》《还珠格格》将亮相美国主流电视台。

然而，中国电视剧进出口情况却常年呈现贸易逆差。比较美、日、韩等影视产业发达的国家，中国电视剧

的输出量和影响力仍然相形见绌。

3、电影

201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全球10大电影市场中，中国的增长速度最快。2013年，中国国产电影以127.67亿元主导国内电影总票房。在10部获利最丰的电影中，国产电影占了年票房收入的71%，这颠覆了以往好莱坞电影占据票房销量半壁江山的局面。

2013年，海外销售国产影片45部、247部次，累计票房和销售收入14.14亿元，同比增长33.02%。22部华语片进入北美院线上映。

4、文化遗产

截至2013年6月22日，中国已有45处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3年12月5日，中国共有38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居世界第一。

5、文化贸易

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以游戏、广告、设计和动漫为代表的新业态，已经替代出版电影等传统产业形态，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第一军团。游戏在对外文化贸易中增长最快，2012年国产游戏出口收入达到5.87亿美元，同比增长45.7%。

6、新闻出版

2012年，中国年出版图书世界第一、日报发行量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总量世界第二、印刷业总产值世界

第三。同时，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大幅下降，由最高时期的15:1，下降到2007年的大约5:1。

7、旅游

2013年，旅游法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出台，全年旅游总收入2.95万亿元，增长14%。

8、文学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教育

2013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2.3%，提高0.5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86%，提高1个百分点；普通高等学校招生699.8万人，研究生招生77.9万人，其中全日制研究生招生61.1万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3200万孩子。

1、科技

2013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2》显示，与美国、日本、韩国和以色列4国类似，“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家创新能力处在一个“超常规”跃升的上行轨道。

2012年7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2、外交

据《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始于1950年。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以及30多

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经常性接受中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有123个。

3、国际贸易

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也成为100多年来首个有此成就的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价值链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服务部门贡献了全球出口增值部分的近一半。从全球看，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例在20%左右，发达国家基本上还高于这个比重，中国只占到9%至10%。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提出，加快进出口结构调整，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今后，中国要提升自身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功能，要增加自身的盈利能力、技术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对外投资

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25%，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6.8%，双向投资表现均明显优于全球水平。2014年1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今年，也可能是明年或者后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很快就可能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针对食品安全，各方力量寻找到共同目标，明确共同责任，才能汇集共同的智慧，贡献共同的力量。作为公共利益的领头者，政府能够与各方共治力量沟通合作，让治理理念和方略真正得到更多的内心认同，从而让促进社会共治的号召动员转化为追求社会善治的自觉行动

共治食品安全

在近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被很多人视作最大亮点的，是明确强调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等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针对百姓关心、政府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共治理念的提出，确实有其历史进步性。至少，这种治理思路与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契合的。在严

峻的现实面前，政府单一的监管力量显得有些势单力薄，而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治理，无论从节省成本还是促进成效方面，都让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未来更加抱有希望。

社会共治是路径，社会善治是最终目标。

多数学者认为善治的核心思想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需明确一点，利益的产生和界定有其时间和历

史局限性。以食品为例，现阶段，安全性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重要利益。如果若干年后，安全性得到充分保障，那么其他内容（如营养性甚至可口性）可能成为新的公共利益。

回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话题，要达到善治，与其相应的公共利益是什么？在中国这个大区域内，它应是大多数人需要的舌尖上的安全。

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一句空话，它的主要主张和捍卫群体是谁？政府或国家组织，作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自然应该承担起公共利益的主要倡导者和捍卫者责任。

强调政府的作用，并不否定社会共治的理念。相反，只有认识到公共利益和政府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如何通过社会共治实现社会善治。善治只有在诚信、责任、合作中才可能实现。

食品涉及企业的商业利益、个人的健康利益、国家的政治利益等，需要多元相关主体的参与和贡献。此次法案修改中提及的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等，恰恰是在建设社会诚信与责任方面的重要力量。

就个体层面而言，我们需要每一个消费者身体里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为道德诚信大厦的重建贡献自己所能。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权力地位高、经济条件好，可以消费高品质或安全食品，可能会盲目认为食品安全虽涉及公共利益但与己无关。但是，当食品安全危机破坏社会诚信，受害者通过报复社会表达自己的无奈与愤

怒时，恐怕远离不安全食品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人利益不会受损。

行业协会和媒体也会面临私己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是单纯维护自己这个圈子的舒适安逸，保护好私己利益，还是在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方面添砖加瓦？这需要有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眼光，要意识到，公共利益与协会利益其实是相对一致的，不存在对立冲突。

食品安全涉及社会多方力量，而它们的协同合作也更可能让食品安全治理开花结果。而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倡导和维护公共利益无法马上给自己带来眼前利益，甚至会程度不一损害私己利益，此时，社会善治如何实现？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隔离甚至对立。殊不知，现代社会，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更多情况下是捆绑在一起的。公共利益的损失，也会带来个人利益的损失，虽然有时这种影响不会立竿见影。

一个安乐幸福的社会当是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最大程度的融合。针对食品安全，各方力量找到共同目标，明确共同责任，才可能汇集共同的智慧，贡献共同的力量。作为公共利益的领头者，政府能够与各方共治力量沟通合作，让治理理念和方略真正得到更多的内心认同，从而让促进社会共治的号召动员，转化为追求社会善治的自觉行动。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名词解释

1、**拉锯效应**：在社会分工更加精细、更加需要团队协作的今天，一个优秀的人才要发挥作用，必须善于与他人配合。人们将此称为“拉锯效应”。

拉锯效应源于日本一家企业的面试：企业负责人将报考者带到一个农场，并随机将每两个人分成一组，然后发给每组一把锯子，要求他们共同将一根圆木锯成两段。在锯木头时，有的组两个人之间没有配合，快慢不当，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把木头锯开；有的组相互配合默契，没多一会儿就把圆木头锯开。结果，这家企业将“能否相互配合很快地锯开圆木头”作为一个人是否被录用的重要指标。

成功后的鲜花和掌声不可能均等地分配给团队里所有成员，在一个团队中，要想达成目标，需要团队中每个成员很好地配合，要有为了集体舍去小我利益的奉献精神。如果一个团队中缺乏配合，每个成员都各自为战，只做自己分内工作，每个人都朝着对自我有利的方向拉动锯子，那么，木头会很难被锯断，这个团队也注定不会成功。

2、**约翰逊效应**：有一位名叫约翰逊的运动员，他平时训练有素，水平稳定，可一到正式比赛就失误连连。心理学家把这种平时表现良好，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从而导致竞技场上失败的现象称为“约翰逊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名列前茅的学生在高考中名落孙山，有些实力很强的运动员却在奥运赛场上发挥失常，痛失奖牌。造成此类“约翰逊效应”的原因，都是因为自信心不足、得失心过重。

要走出“约翰逊效应”的怪圈，必须主动克服对失败的恐惧。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解决方法是看淡结果，保持一颗平常心。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说：“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一个人的进取心太强，对某一事物刻意追逐，太过在意结果，目标就像蝴蝶一样振翅飞远。而拥有一颗平常心则使人心绪宁静、处变不惊，梦想更易实现。